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16—20世纪的 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施爱东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施爱东 著

16—20世纪的 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 施爱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

ISBN 978-7-108-04810-3

I. ①1… II. ①施… III. ①龙—民族文化—研究—
中国②国家—形象—研究—中国—16~20世纪 IV.
①B933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4108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封面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开 本 720毫米×1015毫米 1/32 印张19.75
字 数 230千字
印 数 0,001—2,000册
定 价 6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前言 中国龙的发明

—

2012壬辰龙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毫无悬念地再次说出了“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金色的巨龙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毫无悬念地再度高歌了《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我们知道，“古老东方”、“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政治概念或学术概念。龙的起源虽然早，可是，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却是很晚近的事。

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却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否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Nicolae Spataru Milescu）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

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乱伦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指代中国，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

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二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险家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厦门附近一个深水港湾被中国官方查获，伯来拉因此被投入中国监狱，直到1552年获释，其间与中国囚犯有过密切的交流。伯来拉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做China，百姓叫做Chins，可是，当问起中国人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时，他们却说“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伯来拉非常好奇，接着又问：“你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你们是哪国人，你们怎样回答？”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现在的省。整个国家现在叫做大明，居民叫做大明人。”（《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善恶价值的兴衰问题；近现代改装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转换成了国家政权的存亡问题。政权存亡意味着什么？《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国是一家一姓之国，不是全民之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当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点出所谓的亡国之痛不过是“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自有中国史以来，除了南北对峙的宋代曾有短暂的邻国或敌国观念，大多数太平时期，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为了区别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邻国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他们看来，华夷关系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并列关系，所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儒教中国及其

现代命运》)

有学者专门对《筹办夷务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献中一般自称“天朝”，极少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的使用频率急剧衰减，“中国”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同时，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以“大清国”自称。至光绪年间，“大清国”和“中国”已经取代“天朝”成为正式外交词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由时间维度“朝”向空间维度“国”的转换，是被迫无奈之举。“天朝”被夷人从天射落，降成凡间的“大清国”（同期日本文献只称“清国”），虽然还扭捏着放不下一个“大”字，但毕竟是以国与国的姿态对待“西洋国”了。

那什么是“中国”呢？北宋石介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国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解释，西方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对应的英文是 China，而不是 Central Kingdom，丝毫没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译名“支那”也没这层意思。

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反复遭受外族凌辱，帝国没落之后兴起的新观念。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一直在试图廓清“国家”的观念：“而国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知宪政之为何物，必当先知国家之为何物。”（《宪政浅说》）康梁之外，严复、陈独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都曾著书立说，纷纷阐释何为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由晚清知识分子重新发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个独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包装后的一体化新概念，“中”与“国”已经没有分拆阐释的价值，“中”字不再具有独立于“国”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义。

三

早在 16 世纪之前，就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和冒险家来到中国，他们虽然没有见到真龙，但总有机会见到龙纹。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想象的纹章，他们很难在欧洲文化中找到一个对应物，所以取其形似，一般写作“蛇”（Serpientes）。而且他们从一开始接触龙纹就被清楚地告知，这是“皇帝的纹章”（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这些被视作“蛇形”的龙纹图样，至迟在 16 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当作珍贵的礼品奉献给教

堂以作装饰之用。

最早将中国人的龙观念介绍给欧洲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这些介绍集中体现于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整理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利玛窦在手稿中一般将龙写作 Dragoni，有时写作 Dragone。1616年，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 (D. F. de Riquebourg-Trigault) 将此书译成法文时，一律将龙译作 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 Dragon 的第一次完整对译。

利玛窦之后，接踵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全都自觉地将龙译作 Dragon。作为旁观者，他们对于中国人的龙崇拜有着比中国士大夫清醒得多的认识，中国人常常为了龙的真假问题，与他们展开辩论。中国人普遍认为龙是天上实有之神物，欧洲人则普遍持否定态度。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在《中国图说》中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这话说得直白点，可以直接译成“龙凤是中国皇帝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装饰图案”。

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但这些介绍中很少涉及龙的迷信，偶尔涉及，多与风水信仰相关。也许是出于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对龙文化的介绍往往着重于龙纹，而不是龙传说。在涉及龙性质的问题上，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中国皇帝，用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的话来说：“中国皇帝的标记是龙，有五个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无论用绘画还是刺绣，都必须用龙作装饰。所以，当你说龙眼，龙的，或龙衣，龙的衣裳，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装，由此类推。”(《中国新史》) 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几乎是明末清初所有来华传教士笔下的共识。

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道了龙在中国的地位以及龙纹的使用状况，并未刻意将龙丑化为海怪或妖魔，相反，这些传教士笔下的龙纹总是与皇家气派相伴出现。这样的介绍让那些本来就醉心于东方神秘文化的浪漫贵族心驰神往，中国皇帝御用的龙凤纹章大受青睐。17世纪，“巴黎、都尔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国人的嗜好，仿制中国的以龙为图案的丝织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极其精致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8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更是掀起了一股龙旋风，一些高端贵族甚至模仿中国园林风格建造“龙居”、“龙泉”一类的私家园林，过足了中国皇帝瘾。

欧洲本土龙多是海怪之类的恶魔，而来自中国的龙却是皇帝的纹章，两种略微形似的动物共用了一个名字叫 Dragon。为了区别此龙与彼龙，

欧洲人往往在 Dragon 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 China 或者 Chinese，这大概是“中国龙”的最早源头。

四

西方人看中国，颇有走马观花、旁观者清的好处，往往能撇开枝节直取本质，耶稣会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皇帝—龙—天”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国皇帝是天之骄子，需要依据天命来行使其神圣职权，因此，垄断了沟通天地的龙，也就等于垄断了“奉天承运”的神圣权力，“不但皇帝的服饰上绣有龙，在金银器皿上、屋顶上，以及室内的一切皇帝的用具上都绘有龙”（《中国漫记》）。

龙是皇帝的通天神兽，因而也是专制皇权的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具有神奇的魔力。安文思不无讽刺地指出：“一名无耻的盗贼，备受畏惧和憎恨，只要让他换掉服装，戴上皇冠，披上龙袍，同一个人明天就受到全世界的爱戴尊敬，哪怕众所周知他出身贱微，但他们马上就称他为天子，天下的君主。”（《中国新史》）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或者大野心家，无不梦想着龙袍加身。

身处中国的西方人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理解龙与皇帝的“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并未亲历中国，却又喜欢谈论中国的人来说，要说清楚这层“关系”就有点麻烦，他们很自然地会从欧洲的既有图式中寻找一种对应的“关系”。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家，他从未到过中国，却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断言：“飞龙形象完全是综合多种地上生物设计而成，还有其他一些古代钱币上也铸着龙的形象，龙无疑是中国人国家象征（the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正如鹰之于罗马。”

正因为杜赫德心中已经先有了“鹰与罗马”的既有图式，他才会武断地将“龙与中国”的关系简单地比附成“正如鹰之于罗马”。这种借助既有图式的简单比附很容易为欧洲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华帝国全志》是 18 世纪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也是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名著。“龙是中国人的国家象征”观念自此开始弥漫。

将皇帝或者国王的纹章视作国家象征，无论对欧洲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用《诗经》的语言即可译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说，欧洲人将龙视作中国的国家象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闻一多的后

一个命题，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如何能够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

五

大约在 18 世纪末，中国形象已经开始日薄西山。1847 年之后，著名的“六不总督”，笃信道教的叶名琛主政广东，采取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无为”措施来应对西方人的各种要求、抗议和侵犯，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古怪声名，1860 年的伦敦漫画杂志干脆将他丑化成一条色厉内荏的恶龙。自此以后，英国漫画中的中国龙形象开始游离于皇帝的龙躯之外，既可以用来代表整个国家，也可以加身于肥胖而丑陋的“满大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西方辱华漫画，无论龙形如何千变万化，但“丑怪”的基本特征却是一致的，多数都会在龙头上竖起一根辫子，以标示其中国特色。1862 年之后，大清龙旗不仅普遍悬挂于水师舰船，还被海外商人用作中国商品的广告标志，广泛出现在欧洲的各种报章杂志上，原本尊崇的龙纹不再是贵族阶层专享的纹章，而是悄然变身为遥远东方的、异文化的、野蛮社会的形象代表。

美国漫画中以龙作为中国标识，大约始于 1870 年代末期。由于美国华工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大批美国工人丧失就业竞争力，华工因此被视作最不道德、最肮脏的异教徒。创刊于 1876 年的漫画杂志《黄蜂》(The Wasp)，从一开始就将种族歧视的矛头指向了华人，将华人视作垄断资本的帮凶。他们最初并非将华人画作龙，而是画作猪、蝗虫、老鼠、青蛙、蝙蝠、吸血鬼等丑物。但在 1879 年至 1882 年之间，该杂志接连发表多幅以龙为题材的漫画作品，以丑陋的龙来泛指美国华人。

这些西方漫画中的中国龙，大都采用了夸张的丑化手法，组合了大量的中国元素，虽然与中国人想象的龙相去甚远，却能让人一望而知是象征中国的龙，比如龙头上的辫子、龙身上的大清朝服、龙爪中的鸦片烟枪等。美国漫画的中国龙，总是与鸦片、瘟疫、肮脏、阴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让人望而生厌。

1900 年庚子事变，中国形象跌至史无前例的低值，相应的辱华漫画也增至史无前例的高值。八国联军的野蛮行径被西方媒体描绘成了文明西方对愚昧东方的伟大战争，战争的象征性意义激起了西方许多漫画家的强烈创作欲望，他们模拟“圣乔治屠龙”的经典场景，创作了一系列远征军手刃中国巨龙的漫画作品。

在一幅题为《第一要务》的美国漫画中，一条身上写着“义和团”的

辫子龙，正在恶狠狠地扑向“文明女神”。女神手执长矛对着中国小皇帝说：“你必须杀死这条龙。如果你不干，那就由我们来。”很显然，漫画中的中国龙不仅不再是皇帝的纹章，反而成了愚昧无产者的象征物。

六

虽然西方人已经将龙视作全体中国人的标志，但在中国境内，除了太平天国诸王一度夺得龙纹使用权，龙，依然牢牢地控制在大清王朝的手中，与“这些奴才”没有丝毫亲缘关系。龙旗依然是普通百姓觊觎而不得染指的圣物。

庚子事变是龙与民众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义和团因其“扶清灭洋”的宗旨得到大清王朝的暗中支持，于是得寸进尺地制作了一批做工粗糙的龙旗，打着龙旗四处招摇。时值非常时期，大清王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龙旗被流民僭用。第二年，醇亲王载沣被派往德国赔礼道歉，途经上海时，上海各商会相约高挂龙旗欢送皇亲。面对商民如此“爱国”热情，醇亲王也只得再度默许。不过，龙旗自此一挂，就没有哪家商铺愿意再将它降下来了。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威逼下，中国从“天朝”降格为“大清国”，龙旗从帝王专用旗降格为国旗，国旗从纯官用降格为全民共用，龙也一步步走出皇家大院，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龙，从帝王象征过渡到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已经具备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可就在此时，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帝制覆灭了，龙也遭遇了受株连被打倒的凄惨命运。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这条象征专制皇权的恶龙深恶痛绝，他们将扯落龙旗，砸碎龙椅，赶跑真龙天子视作革命胜利的象征。龙被视作愚昧和落后的象征物，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打倒对象，而不是尊崇对象。

要将已经被打倒的龙重新扶上神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转向19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爱国知识分子急于生产一面全民共擎的抗日大旗，遂检出一个名叫“图腾”的新概念。他们首先将图腾曲解成“原始先民的族徽”，然后试图从上古文献中为中华民族找出这个族徽。他们找来找去，既试过龙、凤，也试过狮、虎、熊、象等等，甚至试过植物和非生物。图腾学者们还没来得及达成共识，抗日战争结束，找族徽的工作也就顺势搁下了。

真正让龙的命运得以逆转是在1979年。由于1978年底美国与台湾政府“断交”，顿失国际身份的台湾社会人心惶惶，急于重建身份认同的台

湾大学生侯德健创作了一首悲怆的《龙的传人》，歌曲一经发表，立即唱彻台湾，旋即风靡整个华人世界，很快传入祖国大陆。正值改革开放雄心勃勃准备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陆。此时也亟须一批励志故事、励志歌曲以振奋人心，《龙的传人》恰逢其时地唱出了人们久违的龙感觉。

龙旗砍倒 70 年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早已淡忘了负载于龙身上的种种屈辱记忆。《龙的传人》在“龙”前加上一个“巨”字，首先赋予其伟大的身躯和无穷的力量，再将“拿破仑睡狮论”中的“沉睡”、“唤醒”诸概念移植到“巨龙”名下，将长江、黄河，以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等中国意象融入“巨龙”名下，不仅赋予“巨龙”以中国符号的身份，还将每一个中国人都定义成“龙的传人”。

“龙传人”、“龙子孙”的新命题有效地将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所有的海外华人牢牢地系于一体，呼应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的时代要求。以民族复兴的名义，社会各界纷纷加入到了龙文化的生产行列，各种与龙相关的或未必相关的信息，都被落实到了龙的名下。正如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传统的发明》所指出的，一种新发明的“传统”，不仅需要与遥远的过去相关联，还得不断形式化、仪式化，强制地反复灌输，直到受众麻木地接受。

学术界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中国人作为“龙的传人”的合法性。龙学者们翻出了 1940 年代来不及得到图腾学界认可的闻一多的《伏羲考》，为它重塑金身，详加阐释，尊为经典，以此作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以龙为图腾的理论依据，衍生出一大批龙文化著作。

在新的民族主义浪潮中，随着《龙的传人》一次次走进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随着《伏羲考》的日益经典化，龙学者们配合着公众意愿，配合着时政需求，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具备的时代，最终完成了龙就是中国，我们就是中国龙的身份建构。

目 录

前言 中国龙的发明 1

第一章 帝王将相及其权力崇拜的“龙政治” 1

- 一、上古“龙”是一个集合名词 1
- 二、龙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3
- 三、龙是祭祀仪式中的执事功曹 8
- 四、龙在帝王动物园中的位置变迁 11
- 五、龙袍是封建帝王的权力标志 16
- 六、帝王将相的龙袍争夺战 19
- 七、龙在皇宫大院的工作职责 26
- 八、龙文化的箭垛式增长 31

第二章 16—18世纪欧洲人理解的“中国龙” 37

- 一、门多萨：皇帝的纹章，即一种盘结的蛇 39
- 二、利玛窦：龙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 45
- 三、基歇尔：龙凤着装旨在引起臣民的敬畏感 49
- 四、安文思：当你说龙，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 54
- 五、李明：中国人赋予龙非凡力量和至上权力 57
- 六、尼古拉：绣在皇袍上的龙有五个爪 61
- 七、杜赫德：龙无疑是国人的国家象征 62
- 八、龙崇拜即中国百姓的皇权崇拜 65

九、风靡欧洲的“龙时尚”	69
第三章 19世纪西方漫画中的“辫子龙”与中国元素	75
一、鸦片战争前英国漫画中的龙与中国元素	76
二、老胖丑怪的“满大人”	80
三、满大人变身辫子龙	84
四、美国排华漫画中的辫子龙	87
五、落魄的巨龙不如狗	93
六、剿灭“黄祸”，瓜分中国	97
七、漫画化的中国元素	106
八、欲加之罪，何患无龙	112
第四章 辱华词汇“猪尾奴”的递进式东渐	117
一、作为辫子的Pigtail	117
二、作为猪尾巴的Pig-tail与Pig's tail	124
三、日语新词锵锵波子	131
四、牙山猪肉大甩卖	134
五、猪尾巴的屈辱	139
六、背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	143
七、与其变自人，何若变自己	146
八、辛亥革命的剪辫乱象	153
九、递进式东渐的辫发政治	156
第五章 哀旗不幸，怒旗不争：大清龙旗50年	159
一、大清龙旗的糊涂账	159

二、外国旗号：认明确系该国旗号，便准入港	161
三、三角黄龙旗：使外国舰船一望即知，不敢妄动	163
四、中国新定旗式：被形势逼出来的追认文件	165
五、外交仪式中最早的龙旗：美国设计、美国制作、美国悬挂	168
六、四方龙旗：官方确认的大清国旗	173
七、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176
八、龙旗飘落：没落王朝的屈辱与遗恨	185
九、龙旗余绪：作为仪式符号被传承	191
第六章 “龙图腾”是学术救亡的知识发明	195
一、图腾者，蛮夷之徽帜	196
二、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图腾主义遗迹	198
三、图腾主义在中国的流行	200
四、民族危难时期的学术救亡运动	203
五、图腾主义在上古史学中的泛滥	208
六、通过历史教育激发民族情绪	214
七、闻一多：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216
八、图腾学者的选择性失明	219
九、闻一多：龙是穷凶极恶而诡计多端的蛇	222
十、被忽视的龙图腾	226
十一、龙图腾在1980年代的勃兴	228
十二、图腾主义的终结	231
第七章 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拿破仑睡狮论”	237
一、唤醒论的由来	237

二、在睡狮与飞龙之间	240
三、唤醒睡狮论的传播	244
四、寻找西方代言者	247
五、拿破仑统摄诸侯	253
六、故事的嫁接与生产	256
七、层累造成的故事与层层剥笋的历史研究	259
结语：对话“龙文化研究”的语境与边界	265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99

第一章 帝王将相及其权力崇拜的“龙政治”

讨论龙文化，最直接的思路，首先辨析龙是什么，其次讨论龙源于何时，基于何物。大多数龙文化论著，也确实是这个角度入手来进入写作的。可是，无论有多少种龙的定义，也无论有多少种龙起源论，都只能是盲人摸象，这根本就是一些永远不可能有正确答案的伪问题。

要追溯龙的起源及其本义，和抓住一条龙一样困难。无论龙这个概念是由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创立的，几乎在这个概念被第二个人使用的同时，龙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当时发生了变化，而且一直在变化，直到今天依然在变化着。

一、上古“龙”是一个集合名词

上古之龙最初也许是一个专用名词，但是，早在先秦就已经被当作代词和形容词广泛使用了。许多龙学家在讨论龙的起源时，往往忽略其代词和形容词特征，一律把它当成名词来讨论，因此，许多被形容或指代的对象也就被视作了龙本身。比如“马八尺以上为龙”^①，意思是说，八尺以上的马被视作像龙一样神骏。可是，许多论者却据此认为：龙就是八尺以上的马，马就是龙的原型。这种逻辑有点可笑。有人将山东日照比作“东方夏威夷”，如果据此认为日照就是夏威夷的原型，那就有点滥原型论了。

龙的概念从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如何定义龙，所以，任何条状动物，都可能被视作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文化史上一切兽头条形的工艺品或生活用品，只要原物上没有明确标示名称，全都可能被释作龙。张光直先生就曾揶揄道：“龙的形象如此易变而多样，金石学家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就带有很大的弹性：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如饕餮、肥遗和夔（kuí）等】名称来称呼的动物，便是龙了。”^②

① 《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廋人》，《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1页。

② 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早在甲骨文金文时代，龙字的用法已经非常多样。我们从上古有关龙的叙述和图像中似乎只能看出两点比较稳定的意思：一是很有威力的神性动物；二是蜿蜒条状动物。正因如此，大自然中的条状物，大凡蛇、蟠、鱼、鲵、虫、蜥蜴、鳄，甚至虎、猪，以及非生物的星座、闪电、彩虹、山脉；等等，全都被不同学者分别解释成了龙的原型。

我们从《山海经》可以看到，古人喜欢借用“龙形”来说明其他怪物的形状：“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南山经》）“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南次二经》）“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南次三经》）“其神状皆人身龙首。”（《东山经》）^①这些怪物都不是龙，只是身体的某些部位有点像龙。对于那些难以理喻的事物，我们往往需要借助共同知识，也即公众熟知的事物来进行类比、加以说明，于是，人们所共知的古怪龙头及其蜿蜒的鳞甲身躯，往往被借用来形容其他怪物。这些怪物若是被画在没有文字说明的器物上，一律会被现代龙学家们释作龙，并据此证明龙的崇高地位。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甘肃西坪出土的马家窑“鲵纹”彩陶瓶，几乎被所有的龙学家释为早期的龙纹彩陶。可是，《海外西经》上清清楚楚地写明在穷山之际、女子国北，有一个“轩辕之国”，该国国民最显著的特征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②。笔者所见，仅马昌仪将此图释作“轩辕国人”^③。

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的文化特征时，会预设一种叫做“中国文化”的文化形态均质分布在中华大地上。事实上，不仅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群对于龙的理解不一样，甚至每一个人所想象和理解的龙都与别人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所论及的龙也不是同一性质的龙。

所以说，上古之龙，并不是特定动物的专有名词，而是所有条状神秘动物的集合名词。既然是一个集合名词，我们要具体讨论其功能特征也就非常困难。尽管许多龙学家对于龙的起源做过精细考释，可是由于上古龙形象本身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几乎所有的考释都只能是盲人摸象。

基于龙性不可捉摸的特点，本章只能悬置对于龙的起源和意义的追究，选择从我们有可能梳理清楚的部分现象出发，讨论汉以后龙在帝王生活中的地位变迁，以及帝王对于龙的态度。

^①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17、23、126页。

^② 同上书，第266页。

^③ 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2页。